

治与道德剥离,从而造成脱离中国语境的弊病。^①从沦陷时期的何其巩和中国学院来看,道德良心与政治忠诚实则存乎于大多数受教育者的观念之中,而非后来的叙述者强加的价值判断。民族国家的认同与道德良心的坚守是历史语境中的真实,而非虚构。何其巩与中国学院之所以能够获得相当的生存空间也源于这种道德感与民族国家认同强大的内在驱动力量。

[作者严海建,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高莹莹)

《晋察冀边区党的文艺政策与实践研究》出版

郑立柱著,人民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23.6万字,68元

该书以晋察冀边区党的文艺政策与实践为研究对象,全面考察了晋察冀边区的文艺政策与具体实践。作者首先考察了抗战时期中共对文艺的认识与定位,探究了中共文艺理论及其对晋察冀边区文艺工作的影响。在文艺队伍建设层面,考察了文艺队伍自身建设的具体举措;在领导和繁荣文艺创作层面,论述了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引导“民族形式”论争、反对“艺术至上主义”倾向、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倡导“穷人乐”方向等引导文艺创作的路径,创办报刊、设立文艺奖、开展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等繁荣文艺创作的举措;在推动乡村文艺运动层面,论述了政策引导与推动、文艺组织推动、专业文艺工作者扶植、媒体推动等推进乡村文艺运动的举措。作者还研究了文艺、中共革命、乡村社会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者认为:中共革命是晋察冀边区文艺发展的主导性动力,对边区文艺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得边区文艺呈现出民众动员的特色,体现着革命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晋察冀边区文艺顺应了中共革命的发展需要,对动员和引导民众参加中共革命发挥了独特作用,从而推动了中共革命的发展和乡村社会的变革;长期受传统文艺影响的边区民众,对革命文艺的态度经历了从排斥到接受、从围观到参与的过程;民众对革命文艺态度的转变,得益于中共政权的多方引导,也与边区文艺创作方向的转变密切相关。

该书所依据的主体资料以河北、山西等省市县档案馆所藏的革命历史档案为主,多数资料属于首次运用,力求在充分收集与解读新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在研究视角上,该书从新革命史的研究路径出发,运用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的视角,系统论述晋察冀边区文艺的整体面相,突出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从文艺的角度来探讨中共革命胜利的历史源流,沟通乡村史与革命史之间的衔接,全面展现了晋察冀边区文艺政策与乡村社会的互动关系。(郭蕾)

^① 相关评论可参见袁一丹《“通敌”还是“合作”:抗战史研究可以去道德化吗?》,《澎湃新闻》2016年1月3日,“上海书评”,澎湃新闻;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415452?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2018年5月7日。